

# 智能时代的新认识论：论布鲁诺·拉图尔的政治认识论

## New Epistemology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On Bruno Latour's Political Epistemology

左璜 / ZUO Huang

(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 广东广州, 510631)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摘要:** 针对已有知识与政治研究中所存在的二元论困境, 拉图尔基于解释学的思想, 通过对“政治”与“认识论”关系的揭示, 以新的“事实”观、“表征”观以及政治“实在观”成功地实现了对经典实在论的批判, 继而建构起了“政治认识论”, 它内涵扁平化本体论、不确定性实在论以及事物政治学。这一认识论为知识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为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认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 政治认识论 实在论 知识政治学 知识民主化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lemma of dualism in the study of existing knowledge and politics, Latour, based on the idea of hermeneutics,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pistemology”, and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criticism of classical realism with new “fact” view, “representation” view and political “reality” view, and then constructed “political epistemology”. It includes Flat Ontology, Speculative Realism and Dingpolitik. This epistemology has opened up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and provided new possibiliti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pistemolog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Political epistemology; Realism;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knowledge

中图分类号: B017; N03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6.005 CSTR: 32281.14.jdn.2026.06.005

伴随着科学哲学研究的社会与文化转向, 知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开始凸显。一方面, 在新一轮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推动下, 知识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开启了微观转向; 另一方面, 在科学与民主融合的背景下, 曾被视为分离对立的知识与政治业已呈现出整合的态势。二者的汇流催生了科学知识的政治学研究, 它“确立了曾归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在科学及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地位, 从而动摇和摧毁了科学主义自我封闭的理性王国。”([1], p.59) 正如劳斯(J. Rouse)所言, “我从实用主义者那里接纳了这样一种洞见, 即权力与知识或真理

的关系是内在的。”([2], p.23) 然而, 这样一种内在的知识与政治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何以能走向融合以实现彻底的民主呢? 对此, 布鲁诺·拉图尔(B. Latour)深入知识建构的内部世界, 推动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 并在解构经典实在论与批判传统认识论、重构“政治生态学”的过程中建构与发展起了政治认识论(Political Epistemology)。这一新认识论为科学哲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更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理性开创了“事物政治学(Dingpolitik)”, 从而拓展了人工智能时代认识论的研究视域。

**基金项目:** 2025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考试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五育融合视域下高考评价体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ZSA250522)。

**收稿日期:** 2025年4月5日

**作者简介:** 左璜(1980-)女, 湖南涟源人, 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教授, 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Email: 15920441418@163.com

## 一、拉图尔政治认识论的生成

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巴黎学派领军人物的拉图尔，其理论著述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这些作品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杂乱，但有着一条共同的主线，即要从根本上对‘知识建造过程’予以描述。”<sup>[3]</sup>从《科学在行动》到《法国的巴斯德化》，<sup>[4]</sup>、<sup>[5]</sup>拉图尔成功地打开了将政治引入科学研究的大门，而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与《潘多拉的希望》中，<sup>[6]</sup>、<sup>[7]</sup>拉图尔则深入社会研究与技术研究世界，跳出二元对立思维怪圈，努力寻求政治与“知识建造过程”的内在关系。最终，真正确立并发展“政治认识论”思想的则是《自然政治学：如何将科学融入民主》与《让事物公开化：民主的氛围》这两部重要著作。<sup>[8]</sup>、<sup>[9]</sup>循着拉图尔思想的发展轨迹探觅后，我们不难发现，其“政治认识论”的形成有着基本的脉络：先探寻并揭示“政治”与“认识论”的内在关系，而后回归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阵地，以实现民主的政治诉求为导向而重构科学认识论，继而踏入“科学”与“政治”的相遇地带，以“政治认识论”作为方法论对传统政治生态学展开深刻的批判与重构。

### 1. 揭示“政治”与“认识论”的内在关系

在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这对内在“博弈者”始终推动着西方政治认识不断发展。前者表征为以知识的方式处理政治，包括以知识的标准设定政治的基础、以知识的理想代替政治方案、以知识人作为主要的统治精英等等，后者则表征为以政治的方式处理知识，包括政治情境对知识的刻画与渗透、知识成为统治技术和手段、政治借助于知识获取合法性资源等等。（[10]，

pp.72-73）仔细推究，形成这一内在张力的前提便是“知识”与“政治”的二分。对此，拉图尔却始终坚信，“知识和政治是并行不悖的，认识论方面的任何转向都会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政治，反之亦然。”（[11]，p.84）秉承这一基本信念，拉图尔沿着“认识论”与“政治”的两条路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二者的内在关系予以探析、论证与阐释。

循着“认识论”的发展历程，拉图尔首先回溯到柏拉图处，对其最有名的认识论哲学思想——洞穴隐喻进行了重新解读。在拉图尔看来，洞穴隐喻表征的是这样一种法制（Constitution）<sup>①</sup>，（[12]，p.16）它将公众生活（Public life）分配在两个不同的居所，洞内与洞外。（[8]，p.37）洞内安居的是人类，他们无法直接看到彼此，只能透过投影在墙壁上的虚像来交流，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被链子锁住了；相反，洞外则是无人居住的非人类世界，它们无法交流，但却是真实的存在。拉图尔将洞穴所隐喻的这一政治模式称为“双舍模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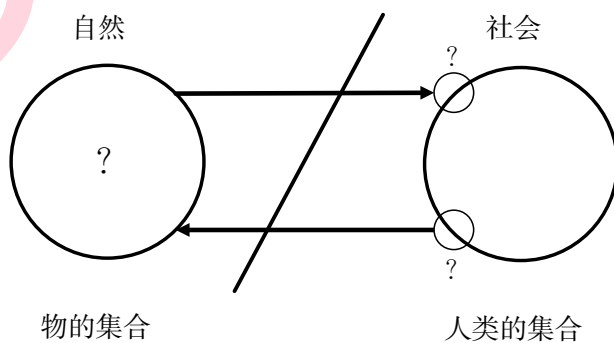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的“双舍模式”

在这种“双舍模式”中，组织便巧妙地将所有权力过渡给了那些能够出入两个居所之间的极少数人。他们拥有惊人的政治能力，“能使无声的世界表达，不受挑战地讲述真理，并能以毫无争议的权威形式来终结那些无休止的

①在刘鹏主译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constitution”被翻译成“制度”和“宪法”。译者以为，“constitution”一词在法语和英语中，有“宪法”和“制度”两层含义。因拉图尔主要讨论的是抽象制度，所以书中将“constitution”多数都翻译成“制度”。具体可参阅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中译本的第16页。但本文作者以为，结合拉图尔的政治认识论背景，“constitution”最好被译为“法制”，它包含了“宪法”和“制度”。事实上，“constitution”这一概念是拉图尔的独创，也是理解拉图尔政治认识论的关键概念。它用来取代知识与权力、自然与社会等之间对立的事物，能事先分配人类与非人类的权力和责任。

辩论。”([8], p.14)由此可见,认识论与政治存在着内在的关系。

对于“政治”,拉图尔则表示,“我们居住在这样一个时代,只要一提到政治生活就会令人沮丧。而这也正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政治究竟是什么的大好时机。”<sup>[13]</sup>为了重构“政治”概念,拉图尔进行了词源学的考察:“政治的”(political)的词根是希腊语的“城邦”(polis),再向前追溯,则发现“政治”同“事物”(thing)的循环有直接关系。这就为重构“政治”概念找到了突破口,因为在“事物”(thing)最古老的用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含义要素,即“聚集”(versammeln)。( [14], p.1177)由此推出,“政治”不再是“一个范畴、一个专业或一种职业,而主要是对能引起公众注意的事物的一种思考。”([11], p.85)总的来说,拉图尔借助词源学的考察,巧妙地将“政治”的本质问题过渡成让“事物”公开化的问题,由此揭示了“政治”与“认识论”的内在关系。

## 2. 批判与重构经典实在论

在科学大战中,逻辑实证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始终围绕科学知识的真理性证明问题而展开争辩,而二者辩护的前提是自然与社会的二分,这都归咎于“现代性法制”。对此,借助对“杂合体”(hybrid)这一本体性论证,拉图尔实现了对“现代性法制”的批判,并成功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可以说,在深层的本体论层面,拉图尔为“政治认识论”建构了存在的空间场域——非现代性世界。而且,在这种新法制下,被割裂的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包括人工智能)获得重新联结,这为“政治认识论”准备了本体论条件。

与此同时,针对逻辑实证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所被人诟病的“表征主义”与“知识旁观者理论”,([15], p.106)拉图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经典实在论。首先,针对已有的“实在”(reality)观,拉图尔以新的“事实”(fact)观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具体批判:第一,借助波意耳的实验法区分事实存在与事实解释,从而将追求“事实的真”转化为“事实的可信”,撼动经典实在论所依赖的确定性“实体观”。第二,

确立“事实”是被建造起来的。对此,拉图尔明确指出,“我们知道事物的本性,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完全可控的环境之下制造出了它们。”([12], p.21)因此,经典实在论的“精确表象”问题被转换成了“事实建造”问题。第三,波意耳将实验室事实的建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在此基础上,拉图尔秉持反对二元对立的信念,将认识论争辩焦点的“表象”问题转化为了“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在此,“表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是被建构的,却不是主体意识单一建构的结果。本质上,“表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中介网络,包括制度、设备、图片、充满文字与图表的论文,等等。第二,在政治领域里,表征还有新的含义,它指的是合法公民因某些问题而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因此,“表征”的特性也就决定了经典实在论所依存的镜像论只不过是虚幻而已。第三,针对经典实在论中的美诺悖论,即“要认识的对象是模糊的,如果已经清晰,则无需认识”这一问题,拉图尔巧妙地规避了这一悖论,他将实在论置入了政治领域予以重构。在此,“实在”就是有争议的事物(thing)(即事实)以一定的方式将其相关行动者(包括人与非人)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公共空间。至此,拉图尔以新的“事实”观、“表征”观以及政治“实在观”成功地实现了对经典实在论的批判,同时也建构起了其“政治认识论”。

## 3. 深化与应用政治认识论

最后,拉图尔进入“科学”与“政治”相遇的地方,以“政治认识论”作为方法论对已有的政治生态学展开批判,彻底放弃掉原来的“自然”概念,进而提出建构崭新的“政治生态学”。在《自然政治学:如何将科学融入民主》一书的开篇中,拉图尔就对已有生态主义话语体系进行了解构,他指出,“‘自然’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实体,而只是一种政治分类的结果。”([8], p.231)因此,我们必须放弃已有的“自然”概念,跳出二元之象,将政治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转变为“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可以取代‘自然’与‘社会’这一范畴的集合体。”([8], p.232)

当然，这样一种集合体绝非简单地将主体与客体、政治与自然相加，而是由具有成为公民能力的人与非人所组成。

如何才能得以组成集合体呢？拉图尔认为，这至少需要经历三次分配方可完成：第一次分配是在人与非人之间进行，它要求我们重新质疑已有的话语与意见。因为“或许连我们对知识与合理性的理解起先都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所影响。”（[2], p.2）许多术语，诸如“权力”“利益”，政治生态学中的“人”，等等，本身就是政治意识的代言人。第二次是将能力重新分配给扮演社会行动者的所有角色，因而生态学应该关注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单一的“自然”。第三次则将这一集体公民定义为实体与反抗所组合而成，并非语言或社会世界专属。经过三次分配后，政治、理性与自然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政治生态学整体转向集体公民的和平。不过，为了避免“集合体”有过早统一的嫌疑，拉图尔又提出了权力新分法，以取代已有的事实与价值分类法。“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权力，一种是思考的权力，一种是整理的权力。前者在混乱的‘事实’与‘价值’磋商中得以保留，后者则于有等级的‘价值’与制度化的‘事实’中得以恢复。”（[8], p.233）这样一来，事实与价值不再可分，而是表征为集合体的两种权力，它们既相异又互补。基于政治认识论，拉图尔要求放弃“单一自然”与“多元文化”的解释，重新走入具体科学世界来使政治生态学获得新生。至此，拉图尔完成了政治认识论的建构过程。

## 二、拉图尔政治认识论的内涵

为了能更好地把握拉图尔的政治认识论，首先必须区分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政治的）认识论“（Political）Epistemology”，另一个则是政治认识论“Political Epistemology”。在《自然政治学：如何将科学引向民主》一书中，拉图尔对二者进行了明确地定义：前者用来指称

为了使政治合理化而扭曲了的知识理论。后者则用于指称在新法制（constitution）框架内为知识与政治重新分配权力的分析与操作。（[8], p.241）尽管“政治认识论”（Political Epistemology）是拉图尔在认识论层面反思科学理论实体时提出来的，但它实质上是一种与“事物为本哲学”保持一致，融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为一体的整体主义哲学。

### 1. 政治认识论的始基与扁平化本体论

政治认识论的提出始于拉图尔对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本体论转向的认同与发展。如前所述，传统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即主体是否能充分准确表征客体的问题。于是，“所有难以逾越的认识论问题都归根于我们是主体，因而始终无法逃离我们自己的思维世界来确定我们的表征是否映射了外在的客体。”（[16], p.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近代认识论哲学视为内在的主体形而上学<sup>①</sup>，它“关注的是内向性，围绕自我意识内向地追问人自身的本性和秘密，其目标是为人及其生存确定内在的根据。”（[17], p.79）由此可推出，要想解决认识论的难题，我们必须回溯到先验的本体论视域中来思考和讨论问题。针对此，拉图尔及其追随者哈曼（G. Harman）提出了事物为本哲学。

当代大多数哲学流派都将主体或文化划定在可见区域，而客体则隐退到不可见视域中。与之相对，事物为本哲学则主张要将客体拉回可见视域中，与主体或文化等内容平等存在（参见图2）。

由图2可以明显看出，在事物为本哲学中，主体与文化都与非人类（包括人工智能）一样，被视为事物的一种，这使得一度被遮蔽和工具化的非人类（客体）重新回归了本体论视域中，成为不可还原为表征的自在自为的行动者（actors）。在此基础上，事物为本哲学为了进一步消弭自然与社会、客体与主体的二分，建构起了新的本体论基础——“集合体”（collectives），而这也恰恰就是拉图尔政治认

<sup>①</sup>尽管“本体论”的概念内涵至今未能统一，但在本文中，“本体论”与“形而上学”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特此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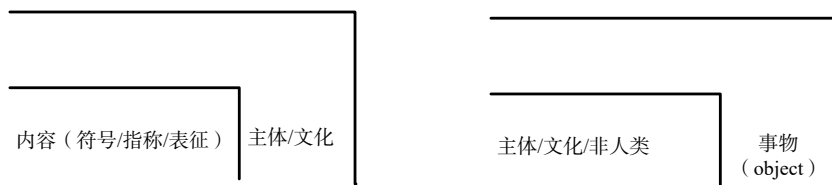


图2 事物为本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体论视域对比示意图

识论的始基。

所谓“集合体”，是一个把所有事物（包括主体和客体）混杂在一起的本体论基元。因此，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在这一概念中获得了平等的本体基础。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并非一切“集合体”中都要同时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正如布莱恩特（L. R. Bryant）所指出的，“我们必须避免将所有‘集合体’都看作是人类的参与。”（[16]，p.25）而在《自然的政治学：如何将科学引向民主》一书中，拉图尔明确地将“集合体”界定为与社会（society）不同的概念，它事先并不区分自然与社会的权力，而是将其圈围在一起，而后再进行权力（包括思考、整理以及跟随的三种权力）的重新分配。

从“集合体”概念出发，以布莱恩特为代表的拉图尔哲学追随者们据此提出了“扁平化本体论”（Flat Ontology），而这也正是政治认识论所根植的本体论思想土壤。在布莱恩特的眼中，扁平化本体论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它主要涵括四大主题：第一，它以批判超越本体论（ontology of transcendence）以及存在本体论（ontology of presence）为己任，否认将某一实体看作另一实体的原因或将实体视为自身全部的存在，主张隐退实体的存在倾向进而彻底动摇“存在优先性”的本体论哲学；第二，它指称，将所有事物融为同一实体的超然“世界”或“宇宙”并不存在；第三，它拒斥将主与客或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任何事物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基础；第四，它认为所有事物在本体论基础上都是平等的，进而取消所有社会、政治、文化理论与哲学中“主体”“人”“文化”的优越性。（[16]，pp.245-246）简言之，扁平化本体论坚持两个主要观点：其一，人类并非

存在的中心，而是诸多存在者之一；其二，不管是否与其他物或人相关联，客体并非处在主体的对极，而是与人类同样自在自为的。（[16]，p.249）以扁平化本体论为哲学基础，以“集合体”概念为阿基米德点，政治认识论便有了生长和发育的合理空间与存在场域。

## 2. 政治认识论的可能与不确定性实在论

回到认识论场域，不难发现，“科学实在论不管有多少种形式，它们的共同点不外有二：一是对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承诺，即承认研究对象独立于科学家的活动起作用。这是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二是相信科学理论的中心概念典型地有所指称，即认为中心概念真实描述了客观实体。这是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18]，p.91）针对这两个基本点，反实在论则强调，思维与实在的关联才是真实的存在；同时，科学理论的中心概念也并非客观实体，而是科学家的主观规定。

由此看来，经典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基本图式就是将自然和客体世界与主体和文化世界做了区分，进而强化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分，因而被誉为“关系主义”。然而，拉图尔哲学则认为，关系主义错误地贬损了客体，低估了客体的多种存在方式。事实上，“主客二分的视角会导致认识论家仅仅只关注表征和命题，而忽视实践与非人行动者在知识产生中的角色。因此，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命题怎样和是否与实在相符合。同时，（会导致）人们忽略实验情境、与物质与工具的互动等等。”（[16]，p.24）基于此，拉图尔巧妙地将“关系”的问题先悬置起来，借助“行动者”这一概念，将实在论转变为政治学问题，从而发展起政治认识论。需要说明的是，拉图尔所提出的政治认识论并非是以政治认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或一般认识论

的分支，即大写的政治认识论，而是奠基于“事物为本哲学”之上的，以重估经典实在论为核心的新认识论，即小写的政治认识论。这种政治认识论要求重新思考“政治”的本质，与已有的“知识与政治”文本保持一定间距，进而实现对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以追求知识的民主化。

不确定性实在论 (Speculative Realism) 首先是反对还原论，主张非还原论 (irreductionism)，它强调，当所有的存在 (entities) 作用于其他存在时，都是真实的实体 (尽管可能强度不一致)。(这些实体) 包括类似于细菌、天气、原子和山脉等非人行动者，也包括诸如哈利·波特，圣母玛利亚、民主和幻觉等。([19], p.5) 可以说，不确定性实在论主张打破传统实在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反对将物质与精神对立。当我们平视一切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与客观实在物时，真正的实在就发生在实践中，因为只有在行动时，实在才得以可能。故实在不再固定，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发生。

### 3. 政治认识论的实现与事物政治学

拉图尔强调，“所有的科学研究巨著都与政治认识论相关，他们并非将政治拓展至科学中，也不是将科学带入政治中。相反，他们将努力去理解差异从何而来以及不同领域的能力分配是如何被判定的。”([20], p.449) 令人兴奋的是，拉图尔不仅提出并建构了政治认识论，还亲身践履了政治认识论。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他成功地运用政治认识论建构起了新政治生态学，彻底放弃原有的“自然”概念，而重新确立起“事物政治学”(Dingpolitik)。

拉图尔通过政治认识论的分析重新赋予了政治生态学以新的意义，他要求放弃“单一自然”与“多元文化”的解释，重新走入具体科学世界来使政治生态学获得新生。在“从现实政治学到事物政治学：如何让事物公开化”一文中，拉图尔批判了“现实政治学”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事物政治学”，分别从身体政治学以及语言的解构来丰富了事物政治学的内涵。

特纳 (B. Turner) 曾经说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主要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都要通过身体这一渠道来表达。”([21], p.6) 针对长期以来所存在的身心二元论，拉图尔主张将身体和心灵、性别的身体和文化的性别建构都理解为一种在连续变化过程中的辩证关系。在“身体、赛博格和具身政治学”一文中，拉图尔阐发了自己对身体的理解，并基于赛博格 (Cyborg) 这样一个隐喻逐步地构建了他的身体政治学思想。他说：“‘赛博格’是一个混合词，一半是网络化的，一半是有机的，用来界定我们后人类、后现代的世纪末存在的可修复性：一半是生理的身体，一半是高技术的机械身体。”([22], p.127) 借助赛博格这个隐喻，拉图尔成功地将“多元自然主义”(multinaturalism) 引入了身体政治学，从而将过去聚焦于二元世界的辨析与争论拉回到另一种凸显民主和现实关怀的科学世界中。

事实上，拉图尔深深地认识到语言 (或概念) 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他所倡导的行动者 (actor) 还是赛博格，又或是法制 (constitution) 等，这都蕴含着拉图尔解构和重构语言的尝试。正如他在“从事实政治学到事物政治学”一文中所提及的，聚焦“事物”来谈政治，“我们之间的联系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关切，而不是因为价值观、观点、态度或原则”。([23], p.14) 正是基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之别，拉图尔才主张，“政治学与占星术一样，也是一门不稳定的艺术”。([23], p.13) 透过语言的重构，事物政治学便得以成立。

## 三、拉图尔政治认识论的贡献

作为一种新认识论，拉图尔的政治认识论在批判传统认识论、瓦解知识等级制度进而推动知识民主化等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它还为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引入了新的视角，意义重大。

### 1. 回应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实现的“哥白尼式转向”提出了经典的认识论问题，即主体意识

如何超越自身而通达对象的问题。康德之后,对此问题的回答主要存在两大倾向:一种是继承和发扬康德的思想,主张认识的过程就是认识对象的构成过程,思维(先天形式与范畴)综合建构对象,即存在者相对于思维而存在;另一种则是直接批驳康德的主张,指出主体本身也是与其他对象一样的独立实在,存在范畴要先于认识范畴,即思维相对于存在者而存在。([24], p.66)然而,不管是哪一种观点,他们都无法跳出康德所设定的主体意识与存在对象分离的二元世界。对此,拉图尔的政治认识论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我们无需再纠结于“表征(即传统认识论中的表象)”的两个方面了,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丰富多彩的“表征”世界本身。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政治认识论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它是研究“接受学”(receptions)、过去与现在、自我与他人的备忘录,因为拉图尔肯定,事物的“表征”与它向谁“表征”以及为了谁而“表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然,拉图尔的政治认识论承认了存在对象的政治学意义,将传统认识论考察的对象——“实体”转换成了在现实中被不断审判和建造的“事实”,继而便为通达“事实”的中介地带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一切经典认识论的问题都被搁置,还有什么会比探寻中介地带更具有吸引力呢?

不管是苏格拉底的超验知识与操作性知识之别,还是柏拉图抑或是列奥·施特劳斯(L. Strauss)的知识与意见之分,乃至当代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等级差异,统统都消解于拉图尔的政治认识论中,因为在拉图尔看来,“为了解释存在,既没有一种智力活动也没有一种具体文化能够彻底承担其界定实在的任务。”([25], p.228)换言之,人类活动中并不存在某一种活动会比另一种更客观、更超越、更理论或更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才被称为彻底民主化的形而上学者。([26], p.35)

## 2. 开启科学知识的政治学研究

另一方面,拉图尔的政治认识论渗透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曾经是爱丁堡学派的

拉图尔,并不完全信奉“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的基本信条,即“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社会秩序的问题。”([6], p.16)反而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两条基本原理:第一,“一条陈述的命运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27], p.176)第二,事实是被建造起来的。从这两大原理出发,拉图尔提出,要想理解科学的形成,必须先悬置已有话语或意见,再去跟随行动中的科学家。因此,不管是《科学在行动》中的鲁道夫·狄塞耳(R. Diesel)还是《法国巴斯德化》中的路易·巴斯德(L. Pasteur),他们所发明的柴油机或细菌理论都不是某一天突然从大脑里冒出来,随后又突然被公众所信奉的。实际上,巴斯德从发现并培植炭疽菌,到走出实验室,再扩展到农村,甚至最后扩大到整个法国一样,他不断联盟新的力量,以政治化的手段来建构起愈来愈强大的行动者网络。可以说,“巴斯德的成功,靠的是一个整体的权力网络,它包括公共卫生运动、医学专业化以及群体的兴趣。”([11], p.83)狄塞耳也不例外。在此基础上,拉图尔宣称,“科学不应被理解成抽象的科学(Science,即大写的S),而应将其视为依靠复杂权力网络的发展与保持来获得成功的一系列实践。”([11], p.83)由此看来,反对科学本质抽象化,以权力关系网络透视科学的本质是拉图尔政治认识论的又一重要体现。

当然,知识的等级分类如此根深蒂固,以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至今难以逾越。从政治的视角予以审视,这种分类制度很明确地区分出了知识“贵族”与知识“平民”。一切实践知识都被蔑视,而拥有实践知识的平民(Demos)也同样受到轻视。然而,正如拉图尔所指出的,“整体的知识需要的是全部知识,而不是少数知识。”([7], pp.238-239)换言之,贵族式的先验知识与平民的实践知识都是我们需要的,都享有同样的政治地位,不应区别对待。这也是真正“民主”的内在需要。

## 3. 拓展政治哲学视域,走向科学政治学

在西方政治文明的长河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所有政治哲学家建构理论的出发点。据此,劳斯总结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三种

互动关系：第一，运用知识获取权力；第二种关系是在权力被用来阻碍或扭曲知识的获取时出现的；第三种关系，即知识可以把我们从权力的压制作用下解放出来。（[2]，p.12）上述三种互动关系基本上都承认，在本质上，权力与知识各自独立。对此，劳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权力关系渗透到科学研究的最常见活动中。科学知识起源于这些权力关系，而不是与之对立。知识就是权力，并且权力就是知识。”（[2]，p.23）与此类似，福柯的研究也表明，“权力必定被分析为是某种循环的东西，或者是某种以链接的形式起作用的东西。它决不会停留在这儿或那儿，决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决不是可以挪用的商品或财富。权力是通过一个网状组织被运用和行使的。”（[28]，p.98）我们欣喜地看到，劳斯与福柯的工作开启了“知识与权力”关系研究的新路向。然而，由于言语的意识形态制约性，没有更新话语体系，使得二者都很难彻底摆脱被意识形态扭曲的可能。为此，拉图尔选择了与他们走不同的路。

拉图尔主张，重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首要环节就是悬搁一切有可能染指政治、被意识形态所扭曲的话语与意见，直接回到那个混沌的而尚未分明的世界去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在这里，拉图尔找到了能取消“知识”与“政治”二元对立的本体替代物——集合体，进而构造了二维的时间向度：一是现代的向度，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裂逐渐加深、扩大；一是非现代的向度，主客融合在一起，不断走向更为复杂的连接物。随后，拉图尔将集合体引入二维的时间向度中，重新勾勒和描绘出一幅崭新的世界图景。只有在这个新世界里，重新分配权力给“组成集合体的各个行动者”才是可能的。换言之，“知识”与“政治”的彻底融合只有在重构“法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而当知识与政治在认识论层面深度融合后，旋即便开启了科学知识政治学研究的新路向，同时也打开了通往知识民主化的理论之门，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认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2022年11月21日，自然（*Nature*）杂志

第7937期专门发文悼念刚过世的布鲁诺·拉图尔，称他为“在实践中彻底改变了科学思想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29]，p.661）谨以此文悼念政治认识论的创始者——布鲁诺·拉图尔。

#### [参考文献]

- [1] 刘邈. 知识与权力——科学知识的政治学[M]. 武汉：崇文书局，2005.
- [2] 劳斯. 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 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3] McGonigle, I. V. 'Bruno Latour: A Philosophical Critic of "Fact" and "Modernity"'[J]. *Science as Culture*, 2012, 21(4): 556-560.
- [4]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Latour, B.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6]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Latour, B.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8] Latour, B.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9] Latour, B. *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 [10] 金林南. 西方政治认识论演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2-73.
- [11] Kennedy, D. 'Knowledge and the Political: Bruno Latour's Political Epistemology'[J]. *Cultural Critique*, 2010, (74): 83-97.
- [12] 拉图尔. 我们从未现代过[M]. 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 [13] Latour, B. 'Biography of an Inquiry: On a Book about Modes of Existence'[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3, 43(2): 287-301.
- [14]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M]. 孙周兴选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 [15] Hacking, I.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6] Bryant, L. R. *The Democracy of Objects*[M]. Ann Arbor: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1.

- [17] 杨大春. 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维度——从20世纪法国哲学看[J]. 文史哲, 2002, (6): 79-86.
- [18] 魏屹东. 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J]. 文史哲, 2003, (3): 86-91.
- [19] Bryant, L. R., Srnicek, N., Harman, G.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M]. Australia: Melbourne Press, 2011.
- [20] Latour, B. 'Review Essay: The Netz-works of Greek Deductions'[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8, 38(3): 441-459.
- [21] Turner, B. *The Body and Society*[M]. 2nd Ed, London: Sage, 1996.
- [22] Latour, B. *Body Cyborg and the Politics of Incarn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3] Latour, B. 'Del Realpolitik al Dingpolitik-o De cómo Hacer Las Cosas Públicas'[J]. *Acta Sociológica*, 2016, 71: 13-55.
- [24] 庞学铨. 论尼古拉·哈特曼的新存在学认识论[J]. 哲学研究, 2007, (5): 59-66; 128.
- [25] Diaz, P. G.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Scientific Realities'[J]. *Athenea Digital*, 2011, 11(1): 225-238.
- [26] Harman, G. 'The Importance of Bruno Latour for Philosophy'[J]. *Cultural Studies Review*, 2007, 13(1): 31-49.
- [27]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 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刘文旋、郑开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 [28]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M].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1980.
- [29] Woolgar, S. 'Bruno Latour (1947-2022)'[J]. *Nature*, 2022, 611(7937): 661.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